

毛泽东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思想探析

陈 静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重视农业的发展、农民问题的解决,提出并实践了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思想,要求以现代化的生产力来改造传统农业。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延缓了这一战略规划有效实现的进程。但是瑕不掩瑜,毛泽东农业发展思想不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国今天农业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探索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也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新中国;毛泽东;农业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6-0028-05

毛泽东的农业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其经验教训是我们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研究毛泽东农业发展道路思想的得失,对于现今我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出发,重视农业的发展、农民问题的解决,提出并实践了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思想,要求以现代化的生产力来改造传统农业。其道路模式一度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飞跃和农村社会面貌的全面改观,它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形成和实践,具有极高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1. 理论价值

第一,毛泽东确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革命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城市工业化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变中

国农村面貌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毛泽东在对世界现代化大趋势的认同与对中国农业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

第二,毛泽东探索了中国农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捷径。毛泽东注重中国传统精耕细作方法,提出“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1]763},“根据生产的需要,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实验和改制,积极推广那些适合当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工具”^{[1]764},并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实行农业机械化。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实行化学农业,“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1]764}。这就使中国农业既不拘泥于传统,又使农业在发挥传统的耕作优点的同时,与现代的技术和设备联系起来。

第三,虽然毛泽东关于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有些观点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商品经济观点,但他看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

[收稿日期] 2014-10-12

[作者简介] 陈静(1964—),女,湖北黄石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

一认识。虽然他后来未能按最初的设想去领导中国农村的发展,商品经济在农村几乎被扼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有这些认识,实属难得。

2. 实践价值

第一,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施“农业八字宪法”成果显著,全国大部分低洼易涝地和各种低产田得到改良,水土保持工作也大有成效;积极发展养猪,扩大了绿肥面积,同时国家投资兴办了一些现代化的化肥厂,使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有了很大的增加;棉、麦、稻、薯等主要农作物的良种已经基本普及;合理密植也已经广泛推行;农作物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许多地方还创造了几万亩、几十万亩耕地连片的无病虫害区。加上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使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迅速,1952年为100,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至原来的2.3倍,年均增长3.25%。各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是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如粮食从1949年的11320万吨增至1979年的33212万吨,增长1.93倍以上,年均增长3.78%;同期棉花从44.5万吨增至220.7万吨,增长3.96倍,年均增长5.68%;油料从256.4万吨增至643.5万吨,增长7.14倍,年均增长7.5%;红黄麻从3.7万吨增至108.9万吨,增长28.43倍,年均增长12.3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宝中宝”的粮食,即使在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间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19445万吨增至1976年的28631万吨,年均增长3.94%。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农民收入也有很大提高,以平均每年30%左右的速度增长。1952年至1958年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第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使农业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建立农机修配网,增加投入,发展壮大农机工业和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机化支持保障体系,使农业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80年农用动力中,人:畜(头):机(千瓦)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为100:16:47,畜力相对减少了11%,机力增加了10倍以上。每万公顷耕地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5台,小型拖拉机189台,农用车载重汽车13.5辆,灌溉动力机械570千瓦。机耕面积4200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2.4%;机播面积1530万公顷;机收面积435.4万公顷,机械插秧面积19.6万公顷,机电灌溉面积2533万公顷。农业动力结构的变化有力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促进作用。

第三,保障和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在通过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和其他税收,通过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剪刀差”而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后,1957年重工业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8.3%。同时也使轻工业获得较快局长,初步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在“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二、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过程中的失误

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延缓了这一战略规划有效实现的进程。

1. 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单纯强调变革生产关系

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来说,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是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泽东领导全党建立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方向和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建立公有制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需要具体考察决定它的生产力状况,落后或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都会起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中国地域广大,按照农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并且不平衡的状况,应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但是毛泽东却夸大了私有制的危害性,追求超越生产力要求的单一公有制。毛泽东一味地认为,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发展,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他甚至希望以生产关系的跃进来换取生产力的跃进。1955年初级社刚建立不久,毛泽东就要求办大社,指出成功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2]结果,社的规模一下子由几十户发展到一二百户。在高级社建立不久,又很快把高级社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当时盛行的“浮夸风”正迎合了他的心理,一度“证实”了他的理论,同时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标准。人民公社不是农村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它是在低生产力条件下实行的“一大二公”,是人为的结果,所以,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实施科学意义上的大农业。人民公社实施的

平均主义、自我封闭、排斥商品经济、排斥社会分工等做法,实质上是小农意识的表现,它反映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矛盾思想,即不完全的现代化思想和小农意识的大同思想交织在一起。当这种矛盾的思想在实践中被无限放大时,所产生的结果理所当然地事与愿违。在人民公社运行的20年中,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阻滞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第一,阻断了农村市场化的历程,使农业的发展长期处于低速度、低效益的弱质农业状态,整个农村仍停留在“农村——农业——粮食”这样高度单一的经济结构阶段。第二,农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到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还多达2.5亿人。第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却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上级指挥,经营内容和农艺规程无法自主选择,平均主义的分配使得客观上存在着差别的劳动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干好干坏一个样”,消费靠集体分配所得,大家“捆在一起受穷”。第四,人民公社化还使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陷入困境。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兴起的社队企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但其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建设服务,而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加上当时的技术、管理落后,使农村工业化停滞不前。由于农村市场化和工业化受阻,农村几乎处于自我循环的变迁过程,农村城市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2. 夸大了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过分强调政治运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农业大国,诞生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仍在继续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基础薄弱、经验缺乏的中国,时刻面临着各种敌对势力的阴谋颠覆和破坏。这种状况决定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必须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又要对上述威胁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和抵制敌人的文化“渗透”、政治破坏甚至军事侵略,自觉地维护党的性质,保持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深深感到了上述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但是,他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却没能很好地把握和处理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以至于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存在范围和激烈程度,大搞阶级斗争以维护党与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试图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却严重地冲击了经济的正常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它直接扰乱了农业工作和生产秩序,造成了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的时期里,因为阶级斗争还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它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经常性的批判会、斗争会、游行活动占用了大量劳动时间,劳动力不能归田。许多地区生产无人抓,积肥量减少,蔬菜上市量少,水利建设上工晚、出工少,农业工作和生产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的严重混乱状态,农业生产在1967~1969年出现了停滞、倒退的局面。第二,它促使农业发展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过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就开始暴露出了诸多弊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中共八大前后对如何消除弊端、改进体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一些地区的农民还自发地创造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这种探索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于改进经济体制,增添经济活力极为有益。但是,在不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断批判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探索取得的积极成果完全化为乌有,这直接维护和加强了抑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三,它削弱了农业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中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虽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但知识分子阶层却被他错误地划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成了被改造、批判的对象,其积极性遭到了极大的挫伤;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农业高、中等学校等单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农业专家、教授和技术骨干被扣上“臭老九”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惨遭批判和打击迫害,无法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极其微弱。

3. 将群众运动运用于搞经济建设,与严谨、科学、有序的现代化大生产不相容

在注重群众力量方面,毛泽东力图通过政治手段激励群众运动来推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前进。但事实证明,虽然群众运动在非常时期和战争年代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式,而在和平年代,将群众运动运用于搞经济建设,则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严谨、科学、有序的现代化大生产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众运动场面是不相容的。有着最广大群众参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数以亿计的损失和持续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可见,群众运动并不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尤其是在经济建

设中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三、毛泽东农业发展道路思想 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尽管毛泽东在农业发展问题上存在一些失误,但是瑕不掩瑜,毛泽东农业发展思想不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国今天农业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探索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也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1.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长期、艰辛的

从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中可知,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落后等诸多因素,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民素质及农村的组织结构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对其改造不能“以为通过思想批判开路和几个政治运动就能完成。”^[3]因此,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长期的、艰辛的。在选择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时,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合理地减轻农民负担,随时研究农业发展的现状和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方案。只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在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发挥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而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2. 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应始终坚持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为标准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毛泽东也肯定了生产力的作用,他试图依靠加快变革生产关系的步伐来改造生产力,为生产力服务。在他的合作化思想中,他主张通过尽早地使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集体经营方式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于是在短时间内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达到了相当高的集体经营程度,高级社也成了惟一的生产模式,这是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的过度重视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结果。在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大国采用某一种固定的统一的模式发展经济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因为任何经济组织形式的合理与否,检验的标准是促使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形成最佳的组合。当生产力处于较低层次时,用代表较高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去取代它,常常导致“超前”行为产生,破坏生产力。因此,中国农业要想有大幅度的提升,走农村现代化之路,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由于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农业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本身的现代化,更是整个农村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现代化。那么我国应在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合理地变革生产关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正是在毛泽东的合作化基础上进行的变革,使生产关系较好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出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优越性,真正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3. 努力调整农业结构,走产业化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毛泽东及以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农业现代化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工程。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业结构单一,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等。结果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这种作法进行大胆革新是非常必要的。由于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存在不平衡、多层次及整体落后等特点,加上农产品结构单一、集约化水平低、技术落后、产业意识弱及近年来农村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的基础上,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走产业化促进现代化的道路势在必行。为此,可革新农村现有的经济组织,大胆采用“公司+农户”或农工贸一体的模式,通过扩张农业规模,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竞争力,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4. 农业现代化道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依托,培育农业市场

从毛泽东的农业发展思想中可知“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农业也应该面向市场。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曾主张,中国“很需再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在1958年农村“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鼓吹要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毛泽东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实现产品调拨的主张。他指出:“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个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

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4]不过,由于他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认为商品这些范畴是资本主义的。因为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一旦社会中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5]因此,在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要吸取人为取消商品的教训,使农业真正面向市场,符合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同时,依靠科技兴农,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的产出。在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备的农村通过培育市场主体和市场要素,尽快建立起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市场体系。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5. 实现人的现代化

人是农业现代化的承担者,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有现代化的农民,即农民素质的提高。而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显然不适应现代化农业的需要。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科教事业,提高农民素质。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制,在农村青少年中杜绝文盲、半文盲;另一方面,要抓好现有农民的教育与培训。两方面相比,后一方面显得更为复杂、艰巨。根据当前农村实际,除了要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由农科站、文化站组织农民学技术、学文化外,还应创造条件,采用广播、电视、电脑等现代信息手段,因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此外,应建立专门的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并由专人负责组织实施,以保证教育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地长期坚持下去,造就一

支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型农民队伍。

6. 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毛泽东一再强调改善农民的生活是农业合作的最终目的。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因为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为群众服务,给人民以东西;农业合作化的方式是组织群众,即经过合作化;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路线是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合作化的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的话振聋发聩。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就与党和国家把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作为改革的最高宗旨是分不开的。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57.
- [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0.
-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296.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责任编辑:言省)

Comments on Mao Zhedong Though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oad in New China

Chen Ji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Set out from China's history and reality, Mao Zedo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solution to farmers' problems, and he proposed and practiced the idea of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then required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Mao Zedong's strategic planning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as correct. However, due to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the 'left', there existed some problems which delaye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operation. But one flaw cannot obscure the splendor of the jade. After all, Mao Zedong thought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and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our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today. His turnovers in the 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domestic agriculture have offered us lots of useful lessons.

Key words: New China; Mao Zed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oad

